

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在西方的经典化

——从《兰舟》到《玉镜》

王 昱 范武邱

【摘 要】中国传统女性文学源远流长,成就斐然,却长期处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被中外学者所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推出了三部中国传统女性文学英译选集——《兰舟:中国女诗人》《中国传统女作家:诗歌与评论选集》和《玉镜:中国女诗人》,向读者系统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从而开启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经典化之旅。从选集产生的社会语境、选集的主要特色、译者的编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对三部选集展开研究,能够厘清选集在西方的经典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特色和不足,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选集编撰的努力方向以及如何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个案思考。

【关键词】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兰舟:中国女诗人》;《中国传统女作家:诗歌与评论选集》;《玉镜:中国女诗人》;经典化

【作者简介】王昱,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tinawangyu@126.com;范武邱,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美学、科技翻译,电子邮箱:fanwuqiu@163.com(湖南 长沙 410083)。

【原文出处】《当代外语研究》(沪),2021.2.75~83,110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的美国汉学家研究”(编号16YBA37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历史上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数量众多,并且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仅在明清时代就有两千多名女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并出版了诗词集(殷晓燕2015:86),她们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相较于中国学界,西方汉学家和译者对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关注可谓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以来,美国先后推出了三部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性中国女性文学英译选集,即1973年由美国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钟玲合译的《兰舟:中国女诗人》,1999年由美国华裔汉学家孙康宜编纂的《中国传统女作家:诗歌与评论选集》以及2013年由美国译者迈克尔·法曼(Michael Farman)编译的《玉镜:中国女诗人》。这三部选集的诞生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经典化,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

性主义思潮兴起以来,美国学界逐渐开始改写“以男性经典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的明证。本文拟分别从选集产生的社会语境、选集的主要特色、译者的编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对三部选集进行研究,试图从文选编译的角度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经典化提供参考。

1. 文学英译选集与经典化

“经典”(canon)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kanon,意指《圣经》中区别于“伪经”的“真经”篇章,后来该词被文学研究领域沿用,用来指称权威人士眼中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作品,其特点是巨大的艺术价值、长久的生命力、跨越国界并具备世界影响力。中国文学英译作品的“经典”可被界定为在海外经由多次出版和重译,其影响力跨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为英

语世界读者所广泛接受和喜爱的中国文学作品(厉平 2016:10)。一部文学作品被经典化的标志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得到作家同行、相关学者和海外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和介绍;二是知名度高,在相关文化圈中经常被提及;三是入选专业教材和文学选集,经由知识传授、正式教学等方式得以存续和传播(刘意青 2004:46)。由此可见,文学英译选集的功能之一在于将中国经典文学译介到英语国家,同时还肩负着将其再度经典化的重任;而能够入选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的文学英译选集也标志着作品本身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是指整合了部分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其进行全译、选译或编译,并按一定思路进行编排的文学集注。作为最重要且最有效的经典建构手段之一,中国古典文学英译选集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了编译者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学全景(陈橙 2010:153),为英语世界的主体文学引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中国女性文学英译选集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英语世界零散随意介绍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的弊端,系统梳理了女性文学发展的进程和脉络,重新阐释了女性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推动女性文学由“边缘”走向“主流”,因此其对女性文学作品实现经典化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兰舟:中国女诗人》——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经典重构

《兰舟:中国女诗人》(以下简称《兰舟》)是1973年由美国诗人王红公和华裔学者钟玲合译而成,选集诗歌涵盖了情爱、闺怨、咏怀、乡愁、送别、乱离、爱国等主题,生动刻画了包括闺秀、才女、贵妇、嫔妃、歌姬、道姑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以及十余位台湾当代女诗人在内的中国女诗人群像。作为西方世界第一本系统性的中国女性诗歌英译选集,它的问世立刻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喜爱和关注,除了销量颇高之外,其中数篇译作还入选美国各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材,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ven Owen)

也为其专门撰写书评,足以证明它在美国学界引起的轰动。《兰舟》的出版使西方读者第一次认识到古代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数量庞大、成就惊人的女性作家群体,颠覆了他们以往认为“李清照、蔡琰、朱淑真即是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全部”的错误观念。然而,尽管《兰舟》有向西方世界首次系统性地推介中国女诗人的诗作之功,但它所流露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编排理念上,《兰舟》体现了西方中心式的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副文本的分析可以佐证这一观点。首先,《兰舟》并无序言部分,这不仅削弱了选集的学术严谨性,还给西方读者了解译者翻译动机、翻译思想、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带来了一定困难。在正文中,编译者并没有为读者搭建中国女性文学的整体框架,也没有建构起译作间的互文关联,选集成了单一线性的内容集合。由于缺乏明确编排观念的指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调动他们原有的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化认知来应对这一贸然出现的“文化他者”。另外,译作缺少对作者情况和作品创作背景的必要注释和介绍,从而导致了作者的重要地位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被“隐身”,使人感觉该书更像王红公的一部创作诗集而非英译诗集。事实上,译注对于文集翻译起着阐释、拓展甚至重构文化语境的作用,对译本接受和传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王晔 2019:118)。尽管编译者在正文之后用了几页篇幅对原作者的身份背景和诗作中涉及的文化典故进行了说明,但内容太过简略,且注释中时常把中国女诗人类比于西方著名女诗人的做法(如将李清照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女诗人加斯帕拉·斯坦帕,将吴藻与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相提并论),虽然有助于读者了解该中国女诗人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却难免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二,从编选原则来看,《兰舟》过分依赖编译者个人的主观喜好和艺术品位,而缺乏对中国古典文

学的全景式展现。诗歌文本的选择是由熟悉中国文化的钟玲负责的(迟欣2013:141),而钟玲的台湾学者身份以及她作为诗人的独特艺术视角极大地影响了她的选材偏好,呈现出了明显的个人倾向。纵观《兰舟》所介绍的54位女作家,艺术成就相对较弱的唐代女作家和现当代女作家(其中绝大部分是台湾女诗人)分别占10人和13人;而明清时期大量涌现的两千多位女作家无论从艺术造诣,还是从历史价值来说都远远超过了前两者,编者却仅介绍了其中的10位,并在后记中对清代女作家给出了有失公允的评论:“绝大部分清朝女诗人不过是模仿李清照和朱淑真作品的主题和技巧,却没有超越她们”(Kenneth & Chung 1973:145)。这种过于主观的选材标准使得选集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削弱了《兰舟》作为一部综合性诗歌英译选集在读者心目当中的信服力。宇文所安(1973:105)亦在其书评中直接表达了他的看法:“入选的一些诗歌,特别是一些唐代诗歌实质上是无足轻重的,书中很多地方本应选择更好的诗歌来译。”诚然,根据编译者喜好来选择所译诗歌的做法的确能体现出编译者的主体性,并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动态经典”,但其对边缘作品的过度渲染、对核心作品的有意忽视极易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国女性文学整体形象的误读和误解,遮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真实图景。

第三,从翻译观来看,尽管王红公也尝试兼顾对原文的忠实,但他的诗人身份却导致他抛开理性至上的翻译观转而追求更为炽烈、更具创造性的翻译,从而使作品烙上了他自身鲜明的诗学风格印记。这种坚持“诗意至上”的态度过分强调译作的接受度而忽视了对原文的忠实,从而带有了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钟玲女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王红公像是一只风筝,我的作用则像是拉着风筝的线,当他飞得太高时(指他在翻译时偏离原文太远),我会对他说:‘不行,不能那样’,把他拉回来一些。但诗人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难改变的(郑燕虹2011:129)。”例如,王红公在《兰舟》中对李清照词《如梦令》末句“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的翻译如下:

And startled the gulls and egrets
From the sand bars.
They crowded into the air
And hastily flapped away
To the opposite shore.

译文未对“争渡,争渡”进行翻译,而是增加了许多原文中并没有的意象,而这些意象大抵出自译者对诗作画面自行展开的想象。由此可以看出王红公在译诗时会为了追求艺术美感而进行创造性发挥,导致译作与原作意思相去甚远,模糊了译作与创作的界限。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学界对中国文学译介的目的大多为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用的部分来丰富和改造其自身文化(杨静2014:45),王红公也不例外。虽然身为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但他的美国诗人身份决定了他译介中国诗歌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其个人的诗歌创作提供灵感源泉,并通过中国诗歌元素的融入为美国诗坛注入新的活力。从这点来说,王红公的翻译行为明显体现了西方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兰舟》也因此注定了不能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形象的代表作,而只是一扇从纯文学角度向读者展示中国传统女性文学魅力的重要窗口。

3.《中国传统女作家:诗歌与评论选集》——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经典重构

1999年由美国华裔汉学家孙康宜编纂、63位美国译者合作翻译而成的《中国传统女作家:诗歌与评论选集》(以下简称《中国传统女作家》)甫经面世,立刻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强烈关注。这部选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译介了从汉朝到近代中国120余位中国古代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第二部分则收录了中国历代男女文人有关女性书写的评论文字。《中国传统女作家》的一大创新是首次在中国文学选集中大量选译了以往被美国学界所忽视的明清时代的女性文学作品,使得明清女性诗歌的价值得以被重新

评估。美国著名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West)在推介语中高度评价道:“这部选集可列为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英译选集之前三,它填补了西方文坛对中国女性文学关注的空白。”(Sun & Haun 1999:封底)该选集涵盖面广、编排严谨、注释翔实,展现出了高度的学术价值和编译者的主体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编者孙康宜的华裔身份使得她在《中国传统女作家》中致力于淡化或消除西方中心式的文学观和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她的女性身份又使得她对女性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凸显了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据孙康宜所述,出生于北京、幼年迁往台湾的经历令她“一直处在省籍与语言的矛盾和困惑之中”,因此,她只好“抛开中文世界的语言困惑,埋头苦读英文”。直到去了美国,“在大学苦读的过程中才发现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多彩,觉得自己此前一直埋头于英文世界,到头来却把自己的文化根基忘了,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寻根的欲望,……寻中国文学之‘根’”(宁一中、段江丽 2008:71)。这种深厚的中国文化情结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成为孙康宜从事中国传统女性文学译介活动的深层动因。通过前言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女作家》的成书是一个烦琐漫长的过程,编者孙康宜、苏源熙(Haun Saussy)等精心选材、协调编译工作,并发挥编者主体性将独立的译文按既定框架编排成有机的文学体系,63位译者细心考证人物和原本,修改再三始成译文,导言注释等细致入微,将研究和诠释融合于翻译之中。这部选集打破了以往选集以译介、评述为主的基础性研究,体现了研究者的新观点和对文本做出的新阐释,充分展示了孙康宜作为华裔译者力图将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传播并以此构建中国文化身份的决心。

第二,从编纂意图来看,孙康宜企图通过《中国传统女作家》来重写中国传统文学史的努力亦是十分值得称道的。1997年孙康宜(1997:114)在《读书》上发表了《改写文学史》一文,对自己编纂《中国传统女作家》的缘由、思路和期望详加叙述。她认为,由

于撰写文学史的学者对文学时代观所持的偏见,中国历史上大量优秀的女作家被现代人遗忘了,选集希望通过文本的英译,让更多的人了解实际的文学现象,使中国女性文学进入经典化的行列,进而改写文学史,构建一个新文学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康宜的做法是在《中国传统女作家》中译介了大量被当代人所忽视的明清女性文学作品,并兼顾西方性别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对明清女性文学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诠释,从而赋予了研究对象以世界性经典意义。除了《中国传统女作家》之外,孙康宜还撰写了大量中英文著述,《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文学经典的挑战》及其与魏爱莲(Ellen Widmer)合编的《明清女作家》等文论集中收录了她有关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论述,体现了她对中国古代女性诗学问题的创造性见解,推动了美国汉学界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

第三,通过精心的文本编排,《中国传统女作家》开放性、情境性地呈现了中国女性文学史的整体图景。具体而言,编者以历史朝代为界,以人物为主线,首先用大段文字介绍了该诗人的社会身份、生平经历与文学成就,然后是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英译,同时辅以大量学术性注释,或解释诗行当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地理名词、民间风俗典故,或对诗歌出处进行考证,有助于读者跨越文化差异,深刻了解中国文学传统。该选集的另一编排特色是辟出“评论文字”部分,编者选取了51位古代文学家有关女性书写的评论文字,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呈现同时代评论家的女性主义文学观。这些评论性文章的收录不仅从侧面完善了中国女性文学史,还为相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除了旁征博引的注释和评论,《中国传统女作家》还运用了大量其他的副文本手段,如充满中国传统韵味的封面仕女图、翔实的编者序言、扉页上由“民国四姐妹”之一的张充和女士书写的、带有浓烈女性主义色彩的“女”字、明清时期女诗人活跃区域的地图、对宋词及词牌名的介绍文字以及古代中国朝代编年表等,都为读者切近感知中国女性文学的魅力提供了全方位的

情境要素。

总体而言,在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性主义盛行的新形势下,《中国传统女作家》以其恰当合理的选材、重点突出的编排、可读性强的译本和细致严谨的考证体现了高度的学术和文化价值,而丰富的副文本要素又为选集增加了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王琴玲、黄勤 2015:81)。通过重新发现、翻译和阐释文本,《中国传统女作家》让明清女作家这一被忽视的群体重新出现在现代读者面前,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进入经典的行列。自出版以来,《中国传统女作家》被美国各大高校中文系选作教材,并被众多高校图书馆竞相收藏;参与了选集翻译的美国学者们也纷纷投身到中国传统女性文学这一研究领域,一时掀起了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女性文学尤其是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热潮。可以说,《中国传统女作家》在推动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经典化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力是其他选集所不能比拟的。

4.《玉镜:中国女诗人》——回归美学的经典重构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典文学的海外传播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英译本的影响范围从美国学者和文化精英扩展到了普通大众,功能亦从促进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扩展到培养和提高西方读者对不同文化的文学鉴赏力和感悟力。故此,这一时期外国译者开始追求用英文传达汉诗所独具的音韵美,并力图使其在西方读者中产生美学上的认知共识(刘萍、包通法 2017:83)。2013 年美国白松出版社出版的《玉镜:中国女诗人》(以下简称《玉镜》)即是采用了不同于学术型《中国传统女作家》的大众化路线,将读者群定位为普遍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以“用丰富的当代英语语言重现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诗学特征”(Farman 2013:13)为宗旨,凸显了文学英译选集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应具有的美学鉴赏功能。《玉镜》由美国译者 Michael Farman 带领其他四位译者 Emily Goedde、Grace Fong、Geoffrey Waters 和 Jeanne Larsen 编译而成,出版后得到了美国诗歌界的一致好评,美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赤松评价其“译文精致优美、令人爱不释手,是难得一见的成就”

(Farman 2013:封底)。其对译作文学性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译者均为积极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当代翻译工作者,并在翻译界具有一定的名气和声望,这就保证了选集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五位译者文化身份的多样性还起到了消解译者的个性局限、为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视角和审美体验的重要作用。作为编者和译者的 Michael Farman 是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会员,在中国文学翻译方面颇有造诣。已故的 Geoffrey Waters 译著颇丰,曾因翻译白居易的《长恨歌》获得 2007 年威利斯·巴恩斯通翻译奖。其余三位译者均为女性,Emily Goedde 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著名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Paper Republic”(纸托邦)的译者之一;Grace Fong 任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中文系,她致力于中国古代女诗人研究并创建了开放式明清妇女作品数据库;Jeanne Larsen 集作家和译者为一身,曾出版唐代女性诗歌和薛涛诗歌英译选集。如著名译者 Jerome Seaton 在封底推介语中所说:“Mike Farman、Jeanne Larsen 和 Geoffrey Waters 同属过去 20 年中最优秀的诗歌译者,而 Grace Fong 和 Emily Goedde 作为新生代译者也毫不逊色,她们为诗歌翻译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Farman 2013:封底)。译者们对中国文学翻译的热爱和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使得《玉镜》成为几位译者同台竞技、展示自我的舞台,为读者呈现了丰富多样的译诗风格,带来了层次分明的审美感受。

第二,《玉镜》在选材编排上的一大特色是其摒弃了对诗歌数量和涵盖面的追求,仅推介了 12 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作品。Michael Farman(2013:11)在引言中解释道:“限制诗人数量是为了尽可能多地集中介绍那些创作了大量作品的女诗人的诗歌。”尽管这种以点带面的做法势必造成中国传统女性文学图景的部分缺失,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举的确能够增进读者对中国女诗人代表性作品风格的了解,从而使读者对传统女性文学产生整体性、印象式的感悟。从副文本角度来看,正文开

始之前由 Michael Farman 撰写的序言简要介绍了中国诗歌和文学女性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演变,并对选集编选思路进行了简要论述;而后的正文部分则以诗人为线索,在译文之前对该位诗人的生活背景、生平经历和文学成就等进行了简要介绍,接下来便把重心放在诗歌译介上。大多数诗人的作品都有两位或以上的译者对其作品进行翻译,供读者体悟不同译者在诠释同一位诗人作品时呈现出的风格之差异,这样不仅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也全方位展现了诗人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诗体风格。

第三,虽然五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各异,表现手法亦有所不同,但 Michael Farman(2013: 11)在序言中阐述了《玉镜》的总体翻译原则,即“用充满活力的现代英语来重现中国古代诗歌”,因此译者均采用自由体翻译,语体简明活泼、口语化,产生的译文多为情感浓郁、意境优美又易于被读者所接受的现代诗歌。以 Michael Farman 翻译的李清照《醉花阴》词为例:

薄雾浓云愁永昼,

Light mist, heavy clouds, a long, dismay day.

瑞脑消金兽。//

Incense gone from the golden beast.

佳节又重阳,

Double Ninth again!

玉枕纱厨,

Midnight chill invades

半夜凉初透。//

jade pillow, silk drapes.

东篱把酒黄昏后,

At the east fence, wine in hand, golden twilight fading,

有暗香盈袖。//

fragrance lingers on my sleeves.

莫道不消魂,

I can't say I'm not beguiled,

帘卷西风,

but west winds lift the curtains,

人比黄花瘦。

and I'm not more fragile than these yellow flowers.

《醉花阴》一词是李清照重阳佳节时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所作,通过对秋景和生活环境的描绘,委婉地表达出独守空闺的落寞以及对丈夫的相思之情。Michael Farman 对原文的理解较为到位,译文通过对词汇的准确运用和诗歌结构的精心安排,不仅成功再现了原文所描绘的意象,也充分传递出词中孤苦凄凉的意境,体现了译者深厚的翻译功底和艺术表现力。对于“重阳”这一文化特色词,译者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简单译成“Double Ninth”,但整句却是充满情感张力的惊叹句,使读者不禁好奇“重阳”这一概念对李清照的特殊意义,于是便自然而然会去参阅译者在页脚处对“Double Ninth”的注释,从而不动声色地引导读者完成对整首词从艺术特色到文化背景的鉴赏过程。

由于《玉镜》的目标读者群是普通大众,因此从译者群体的身份、文集编排方式、副文本的厚度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来看,选集都体现了其专注于文学译介的纯粹性和浓厚的艺术美感之特色。但是,《玉镜》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由于放弃了广度而追求深度,所介绍的中国女诗人涵盖面太过狭窄,以至于读者无法从中了解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发展的全貌,故而大大削弱了其在实现中国女性文学经典化上所起的作用。这也决定了《玉镜》只能作为将中国女性文学推向经典化道路的学术型英译选集《中国传统女作家》的有益补充,用以丰满读者对于中国古典女性文学的感性想象。

5.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女性文学英译选集在英语世界的开山之作,《兰舟》使西方读者形成了对中国女性传统文学的初步印象。《中国传统女作家》因其注释翔实、考据用心、诠释与翻译并存的编纂特色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典女性文学译介的代表作,该

选集在欧美高校和学界受到的广泛关注证明了中国女性文学正在迈向经典化。以复归美学、服务大众读者为主要特征的《玉镜》虽然由于编者缺乏对中国女性文学全景的深刻认识以及政治、市场等非文学因素的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反响,但它以普通大众读者为目标群体的编纂理念为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经典化进一步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般来说,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不仅受制于原作的诗学价值和翻译策略、方法等文本内部因素,还受到译入国意识形态与赞助力量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王小曼、黄忠廉2017:90)。要让更多的中国传统女性作品走向经典化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改变文选编译大多由西方汉学家操控的现状。诚然,西方汉学家在推进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非边缘化”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作为汉学家的他们也必然会受到其角色身份或权力关系的影响而产生对中国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读(杨平2016:48)。因此,在文选的编译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的方式,鼓励更多具有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中国本土学者和翻译家参与进来,使中国成为积极从事自我理解和自我诠释的价值主体。近年来由国家机构牵头的中国文学外译项目大量涌现(胡安江2018:18),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国译者的士气。另外,越来越多的女性学者和译者投身到女性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阵营中来,亦体现了女性敢于为自我发声、力图重构女性文学图景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中国本土译者同海外汉学家的通力合作以及女性译者群体的倾情代言,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世界经典化之路一定会更加迅捷畅通。

参考文献:

- [1]Farman, M. 2013. Jade Mirror: Women Poets of China[M]. New York: White Pine Press.
- [2]Lin, Wusun. 2011. Getting to Know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3]Kenneth, K. & L. Chung. 1973.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M].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4]Owen, S. 1973. Book review: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1): 105-106.

[5]Sun, Kang-i & Haun Saussy. 1999.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陈橙.2010.他者视域中的文学传统——以宇文所安《中国文学选集》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3-158.

[7]迟欣.2013.个案研究:从《兰舟——中国女诗人》的翻译手稿看译者主体性——以文本发生学方法为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39-144.

[8]胡安江.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与反思[J].中国翻译(6):18-20.

[9]厉平.2016.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构建、受制与应对[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17.

[10]刘萍、包通法.2017.论汉诗音韵美共识效度与翻译策略[J].外语研究(4):83-88.

[11]刘意青.2014.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经典[J].外国文学(2):45-53.

[12]宁一中、段江丽.2008.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上)[J].文艺研究(9):70-77.

[13]孙康宜.1997.改写文学史[J].读书(2):111-115.

[14]王琴玲、黄勤.2015.从副文本解读林太乙《镜花缘》英译本[J].中国翻译(2):81-85.

[15]王小曼、黄忠廉.2017.文学西译经典化之路——兼评王峰著《唐诗经典英译研究》[J].外语与翻译(4):89-91.

[16]王晔.2019.《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中的形象建构[J].国际汉学(1):118-124,205.

[17]杨静.2014.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D].河南大学.

[18]杨平.2016.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典籍翻译:成就、问题与对策[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3):46-50.

[19]殷晓燕.2015.汉学视阈下的明清女性文学经典化探析——以美国汉学家孙康宜的观点为例[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86-91.

[20]郑燕虹.2011.风筝之线——评王红公、钟玲翻译的李清照诗词[J].外语学刊(3):125-129.